

2012年8月1日,王火于成都,88歲的他仍未停筆。

他出生於上世紀20年代上海一書香門第,之後開始漂泊的一生:輾轉南京、上海、重慶、北京……最終於上世紀80年代落戶四川成都。

他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師從著名翻譯家蕭乾,抗戰期間只身一人穿梭於炮火之中,報道戰地新聞。上世紀40年代,戰地記者王火開始轉型文學創作,並於1997年獲中國文壇最高獎茅盾文學獎。

如此多的傳奇彙集一身,他,就是著名作家王火。

王火的家中樸素簡單,觸目所及幾乎全是書。書櫃、書桌成了這個居室最顯眼的傢具。採訪當天,他剛與親友驅車從陝西寶雞回來,“長途顛簸,重感冒了好幾天,剛剛好些。”王火說,他是去看望一位在復旦讀書的同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們一起從上海到北京工作。後來他被調到陝西寶雞,再也沒能回老家。近來他身體好像不太好,總打電話問我好不好,語氣中充滿了對老友的眷戀,我就想親自去看望一下他。”

王火說,“嚴格算來,我並不是一個職業作家。在寫作之外,我當過記者、中學校長、出版社編輯,寫小說是我工作之餘的事。”

戰地記者

“我當年的職業理想並不是當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蕭乾、‘大兵記者’恩尼·派爾那樣,成爲一名戰地記者,爲公平正義鼓與呼。”

師從蕭乾 最想做戰地記者

一見面,王火就幽默地對華西都市報記者表示,“咱們還稱得上同行呢,我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做過幾年的特派記者。”翻開王火珍藏的剪報冊,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他就用“王火”、“王洪溥”、“王公亮”等多個名字,在報紙上發表過眾多精彩的新聞特稿,“我用過很多筆名。王火也是自己起的,意思是,‘熊熊烈火燒掉舊社會’。”

1944年,王火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在復旦讀書期間,著名戰地記者、翻譯家蕭乾是王火的老師。提到蕭乾,王火的語氣充滿崇敬,“蕭乾先生教了我兩年,他講授英文新聞寫作。他曾作隨軍戰地記者,親歷過諾曼底登陸等重大國際事件。他是真正的大記者。”王火說,他從恩師那里學到很多東西。比如,蕭乾曾說,一般的新聞,生命力總是很短暫,優秀的記者,要努力將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聞,變成價值持久的歷史記錄。這些都讓王火受益匪淺。“我當年的職業理想並不是當一名作家,而是要像蕭乾、‘大兵記者’恩尼·派爾那樣,成爲一名戰地記者,爲公平正義鼓與呼。”

蔣子龍,男,1941年生,河北滄縣人。曾做過工人、海軍製圖員、廠長秘書、車間主任,現爲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高廠長上任記》、《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中篇小說《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長篇小說《蛇神》、《子午流注》、《人氣》、《空洞》、《農民帝國》等,出版了八卷《蔣子龍文集》,作品多次獲獎。

■ 他當過兵,做過工人,最後卻陰錯陽差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 他在城市生活了大半個世紀,卻總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

■ 他曾以工業題材開“改革文學”風氣之先,又在花甲之年以農民題材長篇轟動文壇。

■ 不熟悉他的人說,他有一張冰冷的臉,但走得近一些,你就能感受到他那善良熱情的內心。

2009年歲末去參加“三駕馬車”書畫展,不料竟在人群中看到了著名作家蔣子龍。遠遠望去,高大硬朗,精神矍鑠,頗有硬漢氣質,絲毫不像年近古稀之人。雖然面容一如既往地冷峻,但記者其後的貿然採訪,他並不以為忤,言談中的耿直率真、幽默睿智更是將一個傳奇作家的快意人生一點點地展現給我們面前。

“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光,爲我儲存了能量。”

身爲滄州人,蔣子龍說自己小時候也曾偷偷練過武,所以性格中“武”的因素比較多。“我的理想職業是軍人,當個旅長團長什么的肯定干得不錯。後來轉業進了工廠,想一輩子就當工人了,卻陰錯陽差成了作家。”走上寫作這條路,蔣子龍開玩笑稱“純屬巧合”,他從初中開始對寫東西感興趣,不斷往各處投稿。後來上了技術學校,學的是理工科的熱處理專業,一直沒專門學過中文。說起投稿,有一件事讓他印象深刻。初二時,蔣子龍學習成績很好,但因為一句無心的話受了警告處分。此後,他投給《天津日報》的稿子被退了回來。一位同學惡作劇地把退稿釘在牆上,還諷刺說:“蔣子龍還想當作家?咱班40個同學,將來出39個家,剩下一個就是蔣子龍。”這件事對蔣子龍影響很大,不過,他把這種挫敗感轉化成了寫作的動力,“有點兒賭氣似的,偏要做出個樣子讓他們看看。”

1979年,一篇《喬廠長上任記》讓蔣子龍轟動文壇,也把他推上了風口浪尖。伴隨着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和茅盾、馮牧等人的贊譽,14個版的批評文章也呼嘯而來。但不服輸的性格卻讓他愈挫愈勇,“報紙上每見到一篇批判文章,我就會在下班路上買一瓶啤酒,再買五角錢的火腿腸,當晚必創作一個短篇,放幾天再改一遍,然後謄清楚寄走。”

正是這種“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精神支撐着他將“改革文學”進行到底,誕生了包括《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鍋碗瓢盆交響曲》、《燕趙悲歌》等大批優秀作品,而擅長工業題材的蔣子

傳奇作家王火

旁聽審判 記錄南京大屠殺

1946年,還在讀大三的王火作爲特派記者,同時爲重慶《時事新報》、上海《現實》雜誌等報刊寫稿。《匱乏之城——上海近況巡禮》、《我所看到的隴海線——換車誤點旅客飽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觸目驚心》等通訊、特寫不斷見諸報端,還是大學生的他,漸漸向一名優秀、成熟的新聞記者靠近。“當時還有讀者寫信到復旦大學,稱我爲‘教授’,其實當時我大學還未畢業。”值得一提的是,王火還是第一批報道南京審判、南京大屠殺案的新聞記者之一,當時,他率先採訪報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軍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等。

王火回憶,1946年2月,他奉命前往南京採訪日本戰犯谷壽夫的審判現場。那天,有不少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出庭作證,“一位滿臉刀傷的少婦,用圍巾半遮着自己的臉,在丈夫的陪同下走進法庭,對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證,她就是李秀英。”王火說,“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站出來。李秀英能主動出庭作證,引起了我的注意。庭後,我主動約訪李秀英。”隨後,王火在上海的《大公報》和重慶的《時事新報》上,以筆名“王公亮”發表了長篇通訊《被污辱與被損害的……》,報道了李秀英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不幸遭遇,轟動一時。

幾十年後,王火在四川聽說李秀英仍健在,還托自己在南京工作的侄兒去醫院探望,引來南京媒體的熱烈關注。正是因爲有這些親身經歷,王火寫出了獲得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戰爭和人》。這部以抗日戰爭爲背景創作的三部曲,第一部《月落烏啼霜滿天》里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殺慘案中,寧死不屈的婦女形象莊嫂,其原型就是李秀英。

熱愛新聞 常關注閻丘露薇

1948年,王火從復旦大學畢業留校當助教。1949年,王火獲得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深造的全額獎學金。但他主動放棄了這次機會,“當時我覺得,世界從此進入和平時期,不會出現大的戰爭,成爲戰地記者的可能性比較小。而且更重要的是,當時新中國即將成立,我想要留下來與大家一起見證、一起建設新中國,我不願錯過這麼一個機會。”王火清晰地記得,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天,“我正在上海市總工會三樓的文教部辦公室裏與幾個同志一起收聽實況廣播,當大家聽到毛主席

龍至此也被貼上“工業題材作家”的標籤。

2008年,67歲的蔣子龍出人意料地以一農村題材長篇小說《農民帝國》再次衝擊文壇,並迅速掀起一陣波瀾。面對書中57萬字跌宕起伏的農民生活,評論家們驚呼:蔣子龍轉型了,他從城市轉向農村,從車間轉向村莊,從工人轉向農民。面對這種所謂題材上的重大跨越,蔣子龍卻頗有些不以爲然,“一個成熟的作家是不會去局限題材的。我關注的是眼前的現實,30多年來,我的筆尖觸摸到了演員、醫生、工人等等,原因就在于我的心里有什么,我對什麼樣的人有感覺,我想去表現他我就下筆,我的寫作不分題材。正如這部《農民帝國》,我對農村歷來懷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會寫一部關於農民的小說。這是情結,也是一種責任。”

蔣子龍所說的“情結”緣於他的童年。從14歲離開家鄉滄縣到天津求學,蔣子龍在城市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但他始終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個農民。“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光,爲我儲存了能量。我每天看天氣預報,首先想到的就是颶風下雨會不會影響收成。現在的孩子們,到公園去玩遊樂場的玩具感興趣,對草地對綠色卻沒什麼感覺。不像我們這代在農村長大的人,見了莊稼特別親。”

從1965年開始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說《新站長》開始,蔣子龍在文壇誠實地“耕耘”了40餘年,至今已出版了90多部個人作品。“關注現實,就會有許多想法,就會有創作的沖動。我比較笨,《農民帝國》斷斷續續寫了11年,人們說十年磨一劍,這個‘磨’在我這裏是‘磨洋工’的‘磨’。長篇的源頭就是命運,就是這個人生活中經歷過的東西,這是不能強來的。我不是那種才華橫溢的人,屬於老牛慢車,細水長流。”蔣子龍屬蛇,“蛇不蛻皮就不大,幾十年來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的靈魂也得一次又一次蛻皮,太過安逸,或停頓不前,意味着靈魂生鏽,甚至已經死亡。沒有活力的靈魂,還能寫作嗎?”

談到當今文壇的一些爭端,蔣子龍不客氣地用了幾個詞:龍爭虎斗、沸沸揚揚、鴉飛狗跳。“文人也是社會的一分子,生活普普通通,自然不能免俗,這可以理解。但身爲一個作家,不能靠自己的作品說話,卻不斷製造諸如牽頭驢去簽售、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聲音時,心中的激動難以用言語表達。”

雖然沒有成爲國際戰地記者,但王火這一生都對新聞十分關注,“我十分推崇20世紀優秀的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的一句話,‘如果你也時常關注唐師曾、閻丘露薇等人的報道,我常常想,如果我在現場,我會如何最大程度接近火線,做到最好。’”

傳奇作家

“(88歲的)我的精力已經寫不了長篇小說了,但並不意味着我完全停筆。除了醞釀一些篇幅較短小說外,我還在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章。”

戰爭和人注入自己的影子

王火說,他寫新聞稿幾乎都不打草稿,一氣呵成,“這種對文字的敏感和把控制,跟我自小對文學的愛好分不開。”王火回憶,“我父親有很多藏書,我從小就讀到了《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而且我的後母吳德芳媽媽對我很好,常給我講一些世界名著,比如《愛的教育》之類的,對我的文學之路影響很大。”1944年,王火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小說,“像《天下櫻花一樣紅》、《墓前》就是那個時候寫出來的。”

新聞記者的職業給王火帶來深厚生活積澱的同時,也讓王火對文學創作的興趣更加濃厚,“很多內容都醞釀在頭腦里想要噴薄而出地爆發,我決心,一定要寫一部史詩性的作品。”王火開始了《戰爭和人》的創作。

《戰爭和人》以主人公董威、董家靈父子在抗戰過程中的行踪爲線索,表現從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到1946年3月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人物行踪遍布大半個中國,具有突出的史詩結構和鮮明的史詩風格。記者問到這部作品具自傳性質時,王火想了想說,“小說不同于報告文學,藝術渲染和加工是必要的。不過,小說中確有很多我自己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没有那些真實的經歷,是肯定寫不出這部作品的。”

脫了衣服去朗誦這樣的花邊新聞來吸引觀衆,這是一種悲哀。”

走進書店“就像農民走進莊稼地”,有一種“想伏下身幹活的沖動”。

寫作正用得着的書、有保存價值的書,佔據了他的房子的絕大部分空間,而且還不斷擴展,面對這種“侵略”,蔣子龍卻接受得舒舒服服,自得其樂。

書店是蔣子龍最喜歡去的地方。他形容自己走進書店“就像農民走進莊稼地”,有一種“想伏下身幹活的沖動”。閱讀可以嫁接人生,“自己的一生無論怎樣曲折都是單調的,我們要知道這個世界都發生了什麼,別人都寫過些什麼,還有什麼是新鮮的。讀書可以滿足這一切。”

蔣子龍崇尚“快樂讀書”,“如同渴了就找水喝,餓了就找食物吃,讀書也要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或者正需要的。”上初小的時候,他讀的第一本課外書是《三俠劍》,晚上還就着昏黃的油燈磕磕巴巴地念給鄉親們聽。後來,他又在家鄉的火炕上讀了《大八義》、《小八義》等傳統評書,知道了人間善惡兩分,俠義長存。到天津上學後,他迷上了小說,從《魯迅全集》到外國名著,一時間讀得昏天黑地。隨着閱歷的增長,蔣子龍的閱讀習慣也發生着變化,如今的他自稱“讀書很雜”,主要看寫作需要的資料書和內心喜歡的各類雜書,所以讀蔣子龍的小說,總感覺他的視野開闊,天文地理、風土人情、民俗典故無所不包。

“讀書首先要有選擇,工作需要讀有用的書,精神需要讀有價值的書”,蔣子龍現在正在看一套展現中華文明以及世界各國文明發展軌迹的《中外文明時空》,全六卷,堪稱大部頭。“我有時也不是精讀,而是大量地瀏覽,選出有用的和有價值的保存下來。”蔣子龍認爲,書要學會“讀”,還要學會“丟”,看準自己需要的書抓住就讀,對於那些沒有價值的垃圾書,溜一眼就扔。

“耳朵光聽新聞、音樂,不聽閒話;眼睛用來讀書、看報,不看閒書;嘴巴自然要吃飯,同時儘量不說假話。”

在家里醒目的地方,蔣子龍總愛挂上家人的照片,看上去樸素卻透着溫馨。雖然作爲中國作協副主席、天津作協主席,蔣子龍有許多社會工作、開會、發言、搞活動常常要佔去很多時間,但這不妨礙他熱愛生活、享受親情。他常說:最

筆耕不輟 獲得茅盾文學獎

但“史詩巨作”的誕生並不容易。王火回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我就開始利用業餘時間構思並寫作《戰爭和人》,本已經寫好了120萬字,但由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時代原因,16年心血寫就的書稿被付之一炬。”上世紀80年代,王火重寫《戰爭和人》。歷經10年磨礪,這部共167萬字的重磅長篇巨作終於完成。1993年,該作品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反響極大,被譽爲反映抗戰文學的偉大史詩,獲獎無數:郭沫若文學獎、人民文學獎、國家圖書獎、茅盾文學獎等重要獎項一一收入囊中,還被選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及“中國新文學大系”。

雖然今年已88歲,但王火並沒有停止寫作,現在,王火正應香港一家雜誌的邀請,撰寫回憶文章《香港回憶錄》。王火說,“我的精力已經寫不了長篇小說了,但並不意味着我完全停筆。”

除了醞釀一些篇幅較短小說外,我還在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章。”在《香港回憶錄》中,王火用細膩的文字寫道,“每天一早,我就按照父親的要求,到六國飯店門口和附近的報攤上去買《大公報》、《南華日報》及其他一些報紙,看戰況和國際新聞及評論……”

王火說,“今年10月,我的藏書、手稿將被送往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那里將會建一個王火文庫。”王火還透露,曾寫過《艾蕪傳》的作家廉正祥,正在寫一部他的傳記。

人物簡介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蘇南通如東。1924年7月生於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後,在上海總會籌委會文教部工作,任編審干事。1950年,王火參與籌建勞動出版社,任副總編輯。參與創辦《工人》半月刊。1953年調北京中華全國總工會,籌辦《中國工人》雜誌,任主編助理兼編委。

1961年被調往山東支援老區,在山東做過十幾年中學校長等工作。曾任山東省作協常務理事。1983年到成都,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參與籌建四川文藝出版社,爲第一任書記兼總編。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現爲中國作協名譽委員。

王火自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創作有《英雄爲國——節振國和工人特務大隊》、《霹靂三年》、《外國八路》、《東方陰影》、《禪悟》、《流螢傳奇》、《雪祭》、《王冠之謎》。電影文學劇本《平鷹墳》等。1997年,其長篇三部曲《戰爭和人》,獲第四屆茅盾文學獎。

順口的飯菜在家里,睡的最香的床在家里,每個人的康樂中心在家里。

除了讀書和寫作,蔣子龍還有許多業餘愛好。這其中,游泳不能不提。“我年輕時興趣廣泛,籃球、乒乓球都打得不錯,還當過文藝演出隊的隊長。後來搞創作,文學佔據了我所有的時間和愛好,1989年前後我的身體狀況很糟糕,後來我調整了作息時間,開始游泳。”當過海軍的蔣子龍水性自是不差,從海河到水上公園的東湖,再到游泳館,這一遊便是20年。即使出國或從外地歸來,不管多晚,轉天一早他準按時出現在泳池邊。非典時游泳館關閉,已經游出了癮的蔣子龍渾身不自在,干什么都沒有精神。無奈,只得陪老伴到公園晨練,打打羽毛球。後來非典警報解除,蔣子龍又有了球癮,每天早上打球、游泳成了“必修課”,“游泳回來沖個涼,吃點兒早餐,往電腦前一坐,寫點兒自己喜歡的,真是一件愜意的事!”心情舒暢,自然身體強健,現如今蔣子龍不僅病痛沒了,而且身手矯健、思維敏捷,游泳自然功不可沒。

同樣讓蔣子龍感到愜意的還有集郵。如果說書是可以攜帶的大學,那麼集郵則是方寸之間看世界,是最省力氣而能瞭解世界的一種捷徑。對於郵票,蔣子龍只重觀賞,不重價值。寫作困乏之時,可以拿出郵冊來慢慢品玩,至於是否保值升值並不留心。他有一本《世界醫學郵票大觀》,里面收錄了5600枚郵票,全部彩印,並配有中、英文說明。當年寫長篇小說《空洞》時曾遇到一個問題:國際防治肺結核病的標誌爲什麼是一個雙十字?請教醫學專家,到網絡上搜索,查閱大英百科全書,均不得要領,最終還是在這本郵票大觀上找到了答案。

蔣子龍長着一張拒人千里的臉,所以不熟悉的人常常先被他冷峻的外表嚇住,繼而認爲他內心冷漠、孤傲。其實生活中他是個古道熱腸的人,談吐睿智,常有些小幽默。1982年秋,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的中美作家聯誼酒會上,美國著名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請蔣子龍解個怪謎:“把一只5斤重的鷄放進一個只能裝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方法把它拿出來。”蔣子龍微笑着,“您怎么放進去的,我就怎么拿出來。”這下輪到金斯伯格吃驚了:“您是20年來第一個猜中這個怪謎的人。”記者問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蔣子龍一臉嚴肅地說:“當然。”繼而,頗有些自得地笑了。

作爲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的那一輩人,蔣子龍的生活卻並不落伍。早在十幾年前,他寫文章就用了電腦,如今他有自己的博客,申請了郵箱,還經常上網搜索資料。對此,他笑稱:在天津重型機械廠干得久了,對機器有種天生的愛好。他給自己的耳、目、口都分配了“任務”:耳朵光聽新聞、音樂,不聽閒話;眼睛用來讀書、看報,不看閒書;嘴巴自然要吃飯,同時儘量不說假話。“這樣才能活得舒坦、超脫。”



快意人生 蔣子龍的